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三三九）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 • — •

—— 增刊 第五〇五期 ——
（二〇〇六年六月十二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606a）

- | | | |
|--------|----------------------------------|------------|
| 【前事不忘】 | 文革史专家徐友渔先生答问录
——揭示文革真相 防止灾难重演 | 李卫平 |
| 【春秋史笔】 | 文革透视——毛氏家天下与党天下之争 | 李（吉力） |
| 【学术争鸣】 | 文化大革命是中共“集体智慧的结晶” | 宋永毅 |
| 【往事如烟】 | 八公山下的再教育
——文化大革命中的1969—1970年 | 方励之 |
| 【当事者说】 | 《亲历重庆大武斗》片断：
军工井冈山总部决定发枪自卫 | 李木森回忆·何蜀整理 |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前事不忘】

文革史专家徐友渔先生答问录
——揭示文革真相 防止灾难重演

• 李卫平 •

徐友渔先生是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著名公共知识分子，中国自由主义学派代表人物之一。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以来，他对文化大革命进行了深入研究，出版了专著《形形色色的造反》，发表了数十万字论文，主持编辑出版了《1966——我们那一代的回忆》、撰写和发表了《蓦然回首》、《直面历史》等书，并与其他学者一道整理出版了遇罗克遗文，提倡认识文革，反思文革，严防文革灾难在新时期重演。

今年是文革发动四十周年，也是文革结束三十周年，随着时间的推移，文革在人们眼中越来越模糊，在一部分人那里甚至产生了朦胧美。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看待这段并不遥远的历史，带着一系列疑问，笔者近日有幸采访了徐友渔先生。

问：文革发生时，您做什么工作？

答：我当时是成都市一中高中三年级学生，正准备考大学。

问：您是造反派吗？

答：是的，还是本校群众组织头头之一。

问：您那一派是受李井泉支持还是打击？

答：我个人没有受到李井泉直接支持还是打击这个问题。我家庭出身不好，开始不能参加红卫兵，也就很幸运，没有做什么坏事。我并不是说别人很坏，自己很好，而是无论想不想做坏事，都没有你的份。

1966年底，大局已经清楚了，毛泽东利用血统论红卫兵，达到搞乱天下的目的后，便将他们抛弃。接着兴起的是造反派，我是这个时候加入的，因为很晚才参加，李井泉打压造反派的时期已经过去。

问：您当时主要都做了些什么？1967年初文革运动的情况怎么样？

答：中学生基本上是大学生的工具，我也不例外，主要就是按照他们的布置，写大字报、刷标语、撒传单、参加游行。

1966年底，造反派与保守派仍然在斗争，因为毛泽东与中央文革的支持，造反派已经占了上风。但到1967年2月，中央军委下发“2.17”信件，据此，军队和保守派开始全面镇压造反派。对于1967年二月发生的事，当时官方贬之为“二月逆流”，现在褒为“二月抗争”。今天官方的正史这样记载：谭政林、陈毅、聂荣臻、叶剑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中南海怀仁堂向文革派发难，后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压制和打击。真实情况是文革派招架不住老师们的进攻，毛泽东大发雷霆，利用其无人能与匹敌的权威，镇压了老师和副总理们的反对。

我认为，“二月抗争”只是1967年二月文革中的一个方面，按照我的亲身经历与体会，真正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是“二月镇反”。造反派在毛泽东江青的支持下，在全国蓬蓬勃勃、发展壮大，要把保守派打下去，导致对方发起一次反攻。在二月的四川，包括成都，天上飞的是直升飞机，地上全是军车摩托车，不是撒传单，就是抓人，四川至少抓了几十万人，成都的监狱已经人满为患，装不下了，以致昭觉寺这样的大寺庙全用来当监狱了。那时全国几乎每一个省都如此，全国至少抓了上百万人。这件事的规模比中南海发生的事件大得多，是更重要的历史。

我个人相信，毛泽东在文革中实际上也想搞军队，所以他煽动造反派起来围攻军队。当时成都的激进造反派，几万人将军区团团围困起来，军队在里面架好了机枪，准备造反派如果冲进去，就开枪。所以有“二月镇反”，军队会出动抓人，这是重要的背景。

问：您是什么时候看透文革，清醒过来的？

答：我因为思想非常正统，比一般人慢得多。我周围的人大概在文革之后一年就开始觉得事情不对头，开始议论纷纷，多有抱怨和不满。

我们这一代积极投入文革的人认清文革有一个漫长的过程，第一步是对政治斗争反感，不再理想化和有纯洁的热情。

为了政治利益，政客在宫廷搞阴谋诡计，背信弃义、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十分正常，古今中外都如此。但毛泽东发动文革，把政治斗争中一切卑鄙无耻的行径公开展示出来，教给几亿人民，叫大家都这么干，该多么可怕！毛泽东相信，应该将这些最坏的东西教给人民，他神经一定有毛病，是一个丧心病狂、非常可笑的人。我觉得他特别不懂人性。

当时的学生都非常天真、热情、纯洁，对文革满怀着美好的理想，结果文革的政治斗争如此肮脏，如此没有原则，他们精神上根本接受不了。例如，毛泽东说：现在是轮到小将们犯错误的时候了。利用完后要一脚踢开，虽然你无限忠于他，他找不到毛病，也必须将错误“轮”给你。这句话多么政客，多么无耻，多么令人寒心呵！它对学生高昂的政治热情是巨大的打击，信念于是破灭。这大约发生在1968年夏天。

但我马克思主义学得太好了，比一般同学好得多，中毒特别深，仍然非常正统。辩证唯物主义有一种思想特别毒害人，明明你看到的都是不对的，它却告诉你，你看到的是现象，本质是好的，你看到的是局部，全局是好的。这种精神骗术至今仍很多，我作为搞哲学的，特别希望揭露这一点。

问：您是否用那套玩意与同学辩论过？

答：是的。我不仅用这一套说服自己，还用来说服和批评已经觉醒了的同学。

第二步是下乡。“革命小将”明显感到，被利用后，不需要你了，就象扫垃圾一样把你赶到乡下，这是从政治斗争失望中得到的觉醒。还有一种从现实观察和经验中得到的觉醒，一直以来，我们接受的教育反复强调，中国的社会制度是世界上最优越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强大最富裕的国家，中国人民过着世界上最幸福的生活，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在受苦受难，主要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我们的责任就是解放他们，文革的目的就是把中国建设成世界革命的基地。但乡下的实际情况令人震惊。在川南农村，有的人家几口人只有一条裤子，谁出去谁穿。社会主义怎么能如此优越呢？！令人无法想象的落后、贫穷与愚昧，立刻粉碎了这一代人从书本上接受的东西。再教育使十几年来与现实隔绝的政治灌输化为乌有，冲垮了我们的思想藩篱，与其目的适得其反。

乡下的“忆苦思甜”教育很有讽刺意义。尽管要忆苦的老农民事前被党支书再三提醒：“要忆1949年前蒋介石的苦，不要忆1962年刘少奇的苦”，但他们主要控诉的依然是六十年代初的大饥荒，而非“万恶的、人吃人的旧社会”。我做了一个调查，发现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我所在的生产队饿死了三分之一人口。这是走向觉醒的第二步。

问：您是在“9·13”事件后清醒的？

答：对我们这一代人正统信仰的最后一次冲击是“9·13”事件。“9·13”太荒谬了，党章宪法写的接班人，为了打倒刘少奇而树起来的副统帅，无限忠于毛泽东的一个人，却搞阴谋诡计要杀掉毛泽东，要叛国投敌，最后摔死在蒙古。也许四川人更具反叛性，我接触到的人不仅吃惊，而且幸灾乐祸，想看毛泽东无法给全国人民交代的笑话。

文革期间，用收音机听“美国之音”算犯罪，但在农村很多知青听，听到美国阿波罗飞船登月也是巨大的冲击。我们面朝黄土背朝天，使用的仍然是三千年前秦朝李冰父子时期的劳动工具，而美国人已到了月球，实在是太令人震惊了。大家意识到受了骗，思想开始转变。

文革砸烂了过去严密的政治控制系统，无产阶级专政松弛了，我们看到了很多以前不可能看到的内部书籍，造成了“资产阶级思想大泛滥”，这是毛泽东始料未及的。

这个政权的政治合法性，实际上建立在一系列近代史政治神话之上：1840年鸦片战争，使中国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在帝国主义的侵略中，所有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都是失效的，惟一正确的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马克思主义，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才找到了富强的道路；共产党内部又有各种各样的坏蛋，如陈独秀、瞿秋白、王明，惟一正确的是毛泽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赫鲁晓夫又叛变，中国成为世界革命的圣地。但下到农村使我们有机会重新思考这一切，学习了解到的事实否定了“中国的制度最优越，中国人民生活最幸福”的神话。尽管我比其他人更正统，但我思考问题比他们都多，经过一番紧张的探索，对这些神话一步步进行清理，“9·13”之前，我便完全清醒了。我的改变不仅仅是对文革本身，而是思想上的全面颠覆。

问：您是独自探索，还是与朋友一起？

答：与朋友共同探索。我们那一代人面对的事实太荒谬了，思想上十分困惑，探索非常活跃、普遍。当时中国不知有几万还是十几万青年学习小组，都在努力研究中国社会发生的现实问题。这些小组一旦被发觉，头头一般都是死刑，其他的人也要判十年、八年。我们知道这种情况，因而非常谨慎，既没有名称，也没有纲领，很松散。虽然如此，已经有人传话，说我喜欢串联，找各种各样的书与人一起学习，已经有这种嫌疑。

问：文革在世界政治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具有十足的中国特色，为什么它发生在中国，而不是其他国家？毛泽东发动文革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反修防修，还是纯粹为了权力？

答：我坚决反对历史必然性的观点。我认为，文革发生在中国并非具有必然性。有些人将文革归咎于中国传统文化，纯粹是瞎扯。当代最骇人听闻的暴行，有什么理由一定要让死去两千多年的孔夫子负责呢？太荒唐了。

共产党从它成立那天起，残酷的内部权力斗争就从未止息，党内清洗一直在进行。从斯大林到波尔布特，都是采取党内斗争模式，毛泽东为了打倒刘少奇及其同伙，为什么不采取这种模式，而要发动群众运动呢？

我认为这与毛泽东的性格与需要有关系。毛泽东个人偏爱和擅长群众运动，从延安整风就可以看出来；党内清洗无法置刘少奇于死地。毛泽东要达到目的，必须将刘的体系整个铲除才行，打倒的人太多，不可能通过传统的党内斗争达到目的。

党内处理无法从肉体上消灭刘少奇。他可以通过认错、辞职等一系列以退为进的做法，保护自己和部属，等待时机，东山再起，毛泽东显然不想给他这种机会。另外，刘主持工作以来，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威信日隆，势力大增，毛泽东对开展党内斗争并无把握。八大之后十多年才召开九大，就是这个原因。毛泽东属于克里斯玛式即个人魅力型的领袖人物，只有废止全部法度，直接与民众接触，“运动群众”，才能操纵形势，达到自己的目的。

我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权力斗争。如果任由刘少奇发展，毛在历史上的结果将完全不同；另一个是意识形态或者建国理想方面的差别。刘少奇是一个比毛泽东更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对现代化、经济建设的兴趣比毛泽东大得多，希望发展生产，想履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的承诺。毛泽东是乱来的人，结果失败了。如果大家都像林彪一样，将失败的原因归咎于没有听毛主席的话，那也不错，但总有人有不同的想法。而且他自己又收不了场，只得让刘少奇出面收拾。刘按照自己的办法收拾残局，效果很好，证明不听毛主席的话，中国的事情会好得多，与林彪说的正好相反。毛泽东感到刘少奇给他造成了极大的威胁，于是决定发动文革。

另外，毛泽东的神经与心理极端病态。他对人极度提防与怀疑，心理极其阴暗，时刻幻想

有人要迫害他、要谋反，于是先下手为强，成为天字第一号迫害狂。这也是文革产生的重要原因。

问：您是哲学学者，怎么会去研究文革史？

答：早在1968年，我就对文革有所反省，联合了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研究文革，虽然当时没有研究出什么结果，但收集了大量资料，整理了一些思想线索。1992年，我在英国做访问学者，研究哲学。一次，在图书馆翻资料看到这样一种说法：文化大革命发生在中国，文革学在西方。这极大地刺激了我的学术自尊心。我暂时放下手头的工作，认真研读了西方文革的研究成果，不能不服气，文革学的确在西方，中国人一点份都没有。

这当然就说不过去了，而且我早期又曾经对文革做过研究，因此下决心做研究。但直到今天，我也不能算文革的正规研究者，我的大部分精力还是在自己的专业上，只不过由于文革研究在中国是禁区，没有竞争，物以稀为贵，所以一不留神成了研究文革的人；我常常出国，接触材料比国内人多，知道别人已经做到了哪一步，避免了重复，很容易找到学术突破点，虽然花的时间不多，但效率很高。这实际上是很可悲的现象，照道理像我这样业余研究文革是说不过去的。

问：文革会重演吗？您认为导致文革发生的条件是否已不存在？

答：严格意义上的重演是不可能的。值得注意的是，现在普通民众向往文革甚至呼唤文革的情绪很强烈。

文革的发生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群众认为中国社会非常不公正。毛泽东就是利用这一点，打着公正与追求群众利益的旗号将民众发动起来的。今天的中国社会在公正性方面存在的问题，比当年有过之而无不及，此即呼唤文革的动力。很多民众与知识分子向往文革，是因为中央政府反腐败的做法没有多少效果。他们对贪官污吏恨之入骨，却无能为力，就想文革多好啊，想斗谁就斗谁，因而希望以文革那种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方式去冲击特权阶层。社会中有人希望国家动乱，盼望无法无天、天下大乱的局面，这是非常危险的。

问：如果此时有人站出来呼吁，要大家一起为社会公正做些什么，是不是有可能重蹈覆辙？

答：这是具有现实性的危险，完全应该正视。因此必须考虑两点：最根本的，必须改变权贵式改革模式，恢复社会公正。只有这样，才能消除大规模动乱的因素；同时应该开放对文革的研究，让中国老百姓知道文革之黑暗残酷。因此，哪怕你今天经受了极其不公正的对待，也应该坚持法治的方式解决问题，以及促使领导人在政治体制改革上有所作为，减少不公正状况，避免重蹈覆辙。就我个人而言，无论现状多么不公正，人们多么愤懑，都坚决反对用文革方式冲击特权，也坚决反对大民主。文革中的大民主是假的。现在这些人之所以向往文革，是因为他们不了解真相。从这一点来看，将文革研究作为禁区，既无道理，又很愚蠢。

问：三月份，摄影家李晓斌先生的文革摄影展被迫关张，我本来已与李先生约好，进行相关采访，但在有关方面的压力下，李先生退却了。当局为什么要想方设法迫使人们遗忘文革？

答：对于谈论文革，中宣部要“严防死守”，我觉得这完全不可理喻。除非他们视自己为文革的罪魁祸首，认为研究文革是揭他们的疮疤，如果不是这样，就不应该这么做。实际上今天在台上的人是不应该为文革负责的。即使作为组织，即便他们在意识形态和政治合法性上与以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也对文革没有直接责任。如果他们学习马英九，代表前人向人民谢罪，那是千该万该，而且是惟一正确的做法，最终一定要这样做的。但他们不仅不这样做，而且反其道而行之，实在令人费解。

问：他们为什么不愿意通过研究文革进行反思？这对他们大有好处呐！

答：就我来看确实如此。我的研究成果告诉大家，文革的大民主是虚假的，希望通过群众运动冲击特权是最糟的。我相信假如我的文章能够在国内公开发表，实际上对维持安定团结的局面，对进行现代化建设，都会起十分正面的作用。他们不这么做，实在是愚不可及。

十年前，文革三十周年时，虽然也有控制，但比现在松一些，我在国内发表了一些研究成果，效果很好，而且丝毫没有危及当政者的利益。当然，之后一些杂志还是被关掉了，看来中宣部还是一个很自觉、很有效率的机构。但今年就是想做同样的事，却根本不可能。现在的领导者讲政治，可能要比十年前的领导人厉害十倍。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

问：他们到底怕什么？

答：我完全无法理解他们，只能重复不可理喻、愚不可及。又没有控诉你的罪恶，你干嘛将自己放到历史罪人、罪魁祸首的位置上？而且我们如实总结文革的教训，如实反映文革的情况，只会对现在有利。人民虽然对现状不满意，但对比那个黑暗的年代，必然会觉得万分幸福，进而珍惜现在的局面，有什么不好呢？！

问：他们大概是怕民众将矛头对准共产党？

答：关键在于如何看这个问题。如果一定要宣称现在做的事情与几十年前一模一样，自己要去承担这个责任，那是没有办法的。但是，如果他们学习国民党对待“2·28事件”的态度，从台湾的经验来看，是可以得到大多数人民的原谅和支持的。毕竟现在的组织与个人并没有整人，刘少奇也不是他们害死的。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对文革采取谴责态度，大家会更拥护你呀！所以我想不通，他们有他们的政治逻辑。

问：如果文革再临的话，您会采取什么行动？

答：我肯定会站出来大声疾呼，这条路只会给中国带来巨大的灾难。

问：那时候可是暴民政治，您忤逆他们的意志，可能会尸骨无存呢？！

答：那我没有办法。文革时，我已是一个超过十八岁的成年人，却那么狂热盲目地卷入其间，经历了最黑暗的时代，做的事情那么渺小，那么可笑，一辈子都羞愧难当。如果再发生文革，不论发生什么后果，我除了去告诉大家，这将把中国引向绝路外，不会再做别的事。我一定会现身说法，不计后果。

问：您对刘国凯的“人民文革”说怎么看？

答：“人民文革”是相对于“官方文革”而存在的，即有人主张有两个文革。总的来讲，我本人倾向于“一个文革”观点，也就是不同意“人民文革”说。我的理由是，如果说有另一个文革，也只能说是利用第一个文革造成的“无产阶级专政”暂时松弛和“天下大乱”的形势而产生的一些现象、活动，是第一个文革的副产品和派生物，而且规模、范围、支配力与主流文革完全不能相提并论。当然，事情也不能只从数量上看，第二个文革和第一个相比虽然微不足道，甚至大多数人对它没有感觉，但从历史的发展看，其“意义”则是巨大、深远的。我们必须承认，在大多数人盲目、狂热地卷入毛泽东打倒政敌的主流运动之外，确实有少数人、少数组织清醒或比较清醒地利用形势，追求自己的利益或政治目标。他们的动机从一开始，而且自始至终都不是响应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号召，而是要在某种程度上动摇、改变现行的制度。杨小凯在《牛鬼蛇神录》中记录的趁乱造反的“右派份子”，1966年底在北京和全国一些地方闹得轰轰烈烈的临时工、合同工组织“全红总”（“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就属于这一类。只有承认和研究这些情况，才能对文革中、文革前中国社会矛盾、民众的生活状况、心理有全面的认识。

问：谢谢您接受我采访。

答：不客气。

2006年5月1日星期一于北京香山

~~~~~  
【春秋史笔】

## 文革透视——毛氏家天下与党天下之争

• 李 （吉力） •

这个题目是我发表在《当代中国研究》上的一篇长文的续篇。那篇长文题为：《论毛泽东现象的文化心理和历史成因》。这个续篇是一部论著的构想，在此仅作一个提纲式的概述。

十年文革乃是毛泽东的文革，是中国历史上名副其实的一位末代皇帝的文革。溥仪不是真正的末代皇帝。中国的末代皇帝是毛泽东。

作为史无前例的千古一帝，毛泽东集秦始皇与陈胜、吴广于一身。他一会儿以秦始皇自居，一会儿又扮演陈胜、吴广，有时甚至同时扮演秦始皇和陈胜、吴广。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先例的。

毛泽东在帝王史的另一个史无前例，乃是集帝王和圣贤这两个角色于一身。毛泽东不仅手握至高无上的权力，而且拥有以前的帝王所从来没有拥有过的话语，或者说，思想体系。秦始皇的集权可谓空前，可是秦始皇没有话语上的权力。秦始皇只能以“焚书坑儒”抑止来自孔孟话语的挑战。

毛泽东的做法，远比秦始皇高明。毛泽东先是以手中的权力，扫平其它所有的话语，然后再用毛式话语发动民众，向共产党夺权。1949年，毛泽东成功地领导共产党夺得了天下。1966年，毛泽东又同样成功地把共产党的天下，变成了毛泽东的天下。即以毛泽东、江青夫妇为核心的家天下，取代了共产党的党天下。

毛泽东通过批判胡适唯心主义、批判胡风、批判《红楼梦》评论上的非毛式意识形态倾向，最后，通过规模盛大的反右，扫平了所有的非毛话语和话语者。整个社会只剩下一种话语，即毛泽东话语；数亿民众的头脑里只剩下一个人的思想，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由此获得了话语上的绝对权力，成为共产党及其治下的中国民众的思想主宰。

自此，既具帝王之威、又有圣贤之名的毛泽东，一步步走上神坛，凌驾与党和人民之上。党和人民，好比两只蟋蟀，在毛泽东的引领下，互相斗过来、斗过去。

毛泽东先是领导和指挥共产党，通过一次又一次的集体镇压和政治运动，还有人为的大饥荒，把人民逼到了水深火热的绝境里。自1949年以后，毛泽东的共产党把中国人民折腾了十七年，折腾得不仅人民受不了、就连共产党都受不了。党内高层当权派，开始请毛泽东住手。先是彭德怀等人在庐山会议上公开叫停，后是刘少奇以阳奉阴违的方式暗中阻止。最后，迫使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作检查。

作过检查、退居二线的毛泽东，开始把嫉恨转向了共产党。其时，以刘少奇为首的党内高官们，误以为可以用明里抬高、暗中架空的方式，把毛泽东高高地捧起来，然后悄悄地抽空掉。想不到，毛泽东借力打力，正好利用他们的吹捧，使自己成为神一般的思想主宰者。一时间，

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国民众的首要生活内容。虽然手中的权力被削弱，但毛泽东却拥有了至高无上的毛泽东话语，或者说，毛泽东思想。毛泽东籍此向党发动进攻，向刘少奇等当权派夺权。

毛泽东以《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作动员令，以“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为号召，煽动全国民众造共产党的反。既然那只叫做党的蟋蟀不愿意继续咬人民了，那么就叫那只叫作人民的蟋蟀反过来咬党。否则，人民被折腾了十七年所积累的怨气、怒气，如何平息？

文革烈火，一点就着。毛泽东一声令下，人民怒潮一般，向党扑去。先是红卫兵，然后是打着形形色色旗号的工人、农民造反派，把共产党从基层到中央政治局，兜底打倒。这可能是毛泽东一生当中，最为得意的时光。历史上没有一个帝王，可以动员老百姓把自己亲手开创的王朝打翻在地。毛泽东将党和人民，同时玩弄于股掌之上。

文革过后，邓小平站在保卫党天下的立场上，逮捕造反派，清查三种人。四十年过后，又有人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提出“人民文革”。党不敢反思文革，害怕人民再次动用毛泽东教给群众运动方式，向党再来一次文革。而民间的反思文革，又暗含着对党的巨大不满。党和人民之间的这种互相指责，虽然都有着各自的理由，但彼此之间恩恩怨怨的制造者，却是把党和人民玩弄于股掌之上的毛泽东。

逮捕造反派、清查三种人固然是邓小平对文革中造反群众的报复，但如今提出“人民文革”，从历史逻辑上说，也是一种自欺欺人。不过，从另一方面说，基于权力寻租造成的严重腐败和贫富对立现实，“人民文革”的提法有着强烈的针对性，暗含着对执政党的极大不满。

作为文革的始作俑者，面对党和人民的共同责问，倒也并非无话可说。毛泽东完全可以责问共产党的大大小小官员，当年你们折腾老百姓的时候，难道没有快感么？你们折腾老百姓起来，什么时候被动过了？一个个生怕不主动似的，竞相邀功，下手一个比一个狠。

毛泽东对造反派也是有话可说的。你们不要装出一付受蒙蔽的无辜模样。你们造反的时候，没有出气的痛快？在这次文革四十周年讨论会上，当年做过造反派的学生、教师，工人，甚至农民，没有一个表示后悔的。当年上海工总司的司令，潘国平，在会上明确表示，假如再来一次文革，他照样还会起来造反。因为在造反和被工作组送进公安局之间，只有选择造反。文革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

毛泽东抓住中国人的嫉恨传统，在党和人民之间种下了难解的仇恨。我把那样的仇恨，称之为福尔玛淋仇恨。这种福尔玛淋仇恨以嫉妒为基本的心理动力。历史上那些著名的造反口号，有的叫做“帝王将相，宁有种乎？”有的叫做“黄天当死，苍天当立”。有的美其名曰：“天下为公。”那意思就是，天下不是什么人专有的，而是人人都可以占有的，就像妓院里的婊子一样。最后，毛泽东总结为“造反有理”。毛泽东因此龙飞凤舞地写道：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事实上却是，天下如此多娇，引无数强盗竞折腰。套用毛泽东对历史的归结，可以说，一些强盗胜利了，一些强盗被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强盗史。

在党和人民之间如此设局，与其说是毛泽东的天才，不如说是几千年的专制传统所致。毛泽东空前成功地继承了那样的传统，以过人的心术和高超的权谋，折腾人民践踏党，把全体中国人扔进了地狱般的黑暗里。最后，是林彪的反抗，击破了毛泽东的神话。

中共 9 大以后，林彪如同庐山会议上的彭德怀和七千人大会上的刘少奇一样，想请毛泽东



罢手。林彪跟周恩来心照不宣地达成共识，结束文革，转向国计民生。但毛泽东不仅不肯罢手，而且反过来准备向林彪下手。先是在庐山会议上向林彪发难，然后又以出巡，挑拨各路诸侯和林彪的关系，向他们吹风，大造打倒林彪的舆论。一向淡泊、被毛泽东强行拖上政治舞台的林彪，忍无可忍，奋起反抗。林家父子，向暴君说不，上演了一出现代刺秦。

林彪的刺秦虽然没能击倒毛泽东手中的权力，但刺穿了毛泽东的话语，刺穿了毛泽东话语构造的毛泽东神话。《571工程纪要》，如同在黑暗中点亮的一把火炬，烛照出毛泽东的真实面目，解构了毛泽东的权力游戏。这是一次向暴君的英勇亮剑。后人应该在毛泽东纪念堂跟前，建造一座剑碑，然后将《571工程纪要》刻写在剑碑上。

林彪事件，使毛泽东受到了致命的打击。毛泽东被迫发下包括《571工程纪要》在内的中央文件，使全国民众读到了林家父子的“讨毛檄文”。虽然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不得不按照毛泽东的意旨，批林批孔，但毛泽东心里明白，他的神像已经褪色了。他不得不向被他打倒的党作出让步。一些被称之为老干部的被打倒对象，开始陆续复职。二号走资派邓小平蠢蠢欲动，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复出。

毛泽东一面很不情愿地把权力还给共产党，一面又物色王洪文那样造反派做接班人。直到他发现王洪文原来是个刘盆子式的窝囊废，才让邓小平重新执掌重权。那时的天下，依然是毛、江夫妇的家天下。

有人说，毛泽东搞掉林彪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林彪有一个林立果那样的儿子，而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却过早地死在了朝鲜战场上。的确，毛岸英的早死，给毛泽东建立毛氏家天下造成了致命的困难。毛岸英的太子地位，是毛远新所无法替代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毛远新也是个刘盆子。只是由于和毛泽东的血缘关系，毛远新才没有像王洪文那样，在毛泽东那里丧失信任。

也正是由于毛岸英的早死，才导致毛泽东起用江青。但江青与毛岸英相比，显然份量不足。林彪事件后，毛泽东让他的女人们，一个个进入权力中心。其中最为显眼的有谢静宜、唐闻生和王海容。还有虽然不太显眼、但除了毛泽东谁都向她毕恭毕敬的张玉凤。

由于右倾翻案而把邓小平重新打下去以后，毛泽东将更多的信任投给了他的女人们。在后来网上流传的由张玉凤披露的那张政治局常委名单上，不仅江青、就连张玉凤都成了政治局常委。假如毛泽东再多活十年、二十年，那么政治局常委中还得加上王海容、谢静宜等毛泽东的女人们。在毛泽东家天下的格局里，执掌最高权力者，与其说是跟毛泽东的思想有关，不如说都与毛泽东的身体有关。由此，毛泽东最终从天下退到了床第，既不是以儒治国，也不是以法治国，更不是以道治国，而是以床治国。

家天下其实并不是共产党人的特色。家天下也不是什么政治理念，而是一种文化病菌。家天下比集权专制的历史还要悠久。中国的集权专制，是从周公建制开始的。而中国家天下的传统，则是由治水的伯禹建立的。二十世纪下半叶，亚洲国家出现了好几个家天下的事例。北韩的金氏家天下，台湾的蒋氏家天下，新加坡的李氏家天下。这些家天下都是现代的变相王朝，意识形态截然不同，权力体制却如出一辙。

毛泽东以家天下取代党天下，既是下意识的，又是无可奈何的退却。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意识到自己在党内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他能够信任的，也只剩下他的女人们。因此，从天下退到床上，是毛泽东专制独裁的必然结果。而从毛泽东这种不无戏剧性的退却上，又可解读当年袁世凯为何称帝的心理秘密。独裁者通常在击败对手、从而没有了对对手之后，会从天下转

向床第，从男性的战场退向女性的怀抱。以袁世凯的权位，不称帝也已然帝了。袁世凯的所谓称帝，不过是为他的十多房太太们挣得皇后皇妃一类的名份罢了。

相比之下，毛泽东的气魄当然要大多了。假如上苍再多给他十年、二十年寿命，那么中国共产党就会变成毛泽东的奶党。由毛泽东的大奶、二奶、三奶、四奶……组成的政治局常委会，领导着中国共产党，统治着十多亿中国人。

也许正是基于文革的历史教训，邓小平才强调集体领导，才下决心建立退休制度，

并且让子女经商赚钱，而不是接班掌权。邓小平以此捍卫了共产党的党天下，做到了毛泽东活着的时候绝对做不到的政治改革。邓家女子虽然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率先富了起来，但邓小平的政治改革，却并不以自己的子女为转移。只是，邓小平是个一半姓刘、一半姓毛的政治人物。邓小平在安邦治国上姓刘，并且比刘少奇更有能力和魄力。可是，一旦面对群众运动，邓小平马上回到毛泽东的立场上，变成一个没有运动群众能力的毛泽东。邓小平无法运动群众，结果当然只有以屠杀来解决群众。

总之，一场文革浩劫，从根本上说，乃是毛氏家天下与共产党的党天下这两种专制之间的斗争。毛泽东胜利了固然是专制，党胜利了，也同样是专制。

毛泽东的文革最后是以失败告终的。毛泽东的权力和毛泽东的话语、毛泽东的帝王之尊与毛泽东的造反有理、毛泽东的思想和毛泽东的乌托邦，最后全都同归于尽。

毛泽东不仅耗尽了传统的帝王资源，而且也耗尽了帝王气十足的话语资源。毛泽东以后，再也不可能出现毛泽东式的集帝王与话语、集秦始皇和陈胜、吴广于一身的帝王。毛泽东是绝代帝王，也是中国历史上的末代皇帝。毛泽东以后的专制者，不是垂帘听政，就是集所有权力于一身，也依然像个公务员。

中国的专制历史，如同一个巨大的黑洞。如果说，周公建制是这个黑洞的入口，那么毛泽东文革则是这个黑洞的出口。当专制的政治资源和文化资源全都耗尽之后，剩下的是由专制的心理和专制的病菌，构成一种专制的习惯势力，支撑着专制的政治体制。执政的共产党固然还没有走出专制的历史阴影，但毕竟受到过文革的冲击。但是，假如再以文革方式来打倒和推翻共产党，那么专制依然有可能以复活的方式得以延续。专制好比白骨精，满清王朝结束以后的各种中国政党好比白骨精附体的专制载体。中国民众真正要战胜的，不是共产党，而是白骨精般的专制。从反对专制起步的共产党，其实也是专制的受害者。重要的不是要不要打倒、推翻共产党，而是能不能战胜专制对中国社会的毒害和对中国人的毒害。至于共产党，既可以成为专制的载体，也可能成为专制的敌人。走出专制传统，是没有任何模式可寻的。

假如真要汲取文革教训的话，那么就得放弃打倒推翻的文革方式、造反有理的文革思维，和声讨、讨伐一类的文革话语。文革话语骨子里是一种权力话语，既以权力为中心的话语系统。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都以权力为中心。造反有理，总是有理在权力的争夺上。从来没有一次起义、暴动或者革命，是以权利为基础的，不是以权力为指归的。每次改朝换代，结果都是专制复辟。

从后向前，纵观中国历史，可以发现，这是一长串改朝换代的多米诺骨牌。假如想要让共产党成为最后一张倒下的骨牌，只能从我开始，站住了不倒。

从我开始有二层涵义。一层是从我自己开始。我是没有我的我，是有独立人格、自由思想

的我。我的能够站立，不在于有无权力，而在于有无权利意识。我并不在意共产党的执政，但我必须坚持和维护我的权利。我想对执政党说的，不是再来一次文革，而是请把我的权利留下。

假如每一个我，都以权利说话，而不以权力为然，那么中国社会就会从一个权力社会，转变成一个权利社会。这是我说“从我开始”的另一层涵义。我相信，权利意识的觉醒，比当年“五四”时期对民主科学的强调，更具思想的自由度，更具社会的建构力。“五四”启蒙领袖没有意识到权利的重要性，致使反对专制要求民主的思想运动，最终被毛泽东话语所替代。

当然，这并不是“五四”启蒙领袖的过错。因为即便是美国，在二十世纪初，也还只是民主国家，并非是个权利社会。美国进入权利社会是从马丁·路德·金的民权运动开始的。因此，我的人文立场和权利意识，不再允许我使用讨伐、打倒、推翻一类的权力话语，而宁可选择马丁·路德·金式的“我有一个梦想……”

2006年5月15日（作者根据《文革四十周年纪念学术研讨会》上的问题发言整理）

~~~~~

【学术争鸣】

文化大革命是中共“集体智慧的结晶”

• 宋永毅 •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邓小平为了从以华国锋为代表的“凡是派”手里夺权，先抢过了对毛泽东思想的解释权，提出了毛思想是“中共集体智慧的结晶”一说。言下之意是：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我邓小平也有实实在在的一份。这样，我来掌权便有了天然的合法性。邓小平当时的“新说”，当然和他的“白猫黑猫论”一样，是纯实用主义的政治伎俩。但是今天我们用来解释文革的发生，倒是一句实实在在的大实话。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和发展，绝不仅仅是毛泽东一个人的事，也不仅仅是他的追随者林彪、江青等人的账，文革中被打倒和清洗的对象，刘少奇和邓小平也都是有份的——他们也曾是文革的积极推动者和拥护者——文化大革命确实实是中共“集体智慧的结晶”，即集体犯罪的结果。

◇ 毛和刘邓在政治上的“分歧”在文革后被人为地夸大了

刘少奇和邓小平无疑是文革的受害者，其中刘还被残酷地迫害致死。就数以百万计的文革受害者的级别而言，刘少奇还毫无疑问是他们中最大的受害者——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副主席。或许正因为如此，在文革后几乎所有的悼念刘的文章里，都只是强调了他“最大的受害者”的身份。又从他这个单一身份的角度，有意无意地推演出毛泽东和刘邓在政治上（不是经济上）的“重大分歧”。文革后重新执政的邓小平正是利用了这一被人为夸大的“分歧”来建立他执政的合法性。

然而，历史的真相却往往是矛盾和吊诡的。在中共五十多年的政治运动中，中共党内的受害者并不只有单一的身份，他们和迫害者的身份常常是合二而一，密不可分。受害者也常常先是迫害者，受害者在意识形态上，和迫害者并没有任何不同。相反，受害者也曾为最后迫害他致死的政治运动推波助澜，即便在他被迫害致死的前一刻和平反以后，他和他的家属仍然认同把他迫害致死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乃至迫害者。

毛泽东关于文革的理论和实践，有着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它起源于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中苏论战”和“重提阶级斗争”，历经“四清运动”的实践，最后才形成了文革的思想。

回顾历史，人们会遗憾地发现：刘邓周彭（真）等中共主要领导人都为之作出了他们各自的贡献，其中尤以刘少奇为大。例如，刘少奇是提出用“造反”来对付“中央出修正主义”的第一人。在1963年6月8日的中央会议上，毛泽东讲话提出了“中央出修正主义怎么办”的问题。刘少奇以“反修专家”的身份回答：“一个省可以造反，也可以独立。”再如，刘少奇对当时全国阶级斗争的估计，比毛泽东还要黑暗的多。毛泽东最初是估计有20%的生产队的政权不再共产党手里，后来受到包括刘少奇、周恩来、彭真等人一再汇报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动向的影响，认为：“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而刘少奇还进一步认为：“三分之一打不住……而是大多数。所以，革命非搞不可。”国内学者肖冬连在论述60年代初期刘少奇和毛泽东极“左”思想的高度一致性时，提出了一个有趣的模式：“毛主席出了题目，刘少奇又要做文章了”（《文革前十年史》）；然后是“毛泽东要表达的意思先从刘少奇口里说出来了，他接过刘少奇的话茬，道出了他的核心思想。”这里，刘少奇的独创性和他对毛泽东反影响力是显而易见的。另外，刘少奇对于毛泽东对文化艺术等方面的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非但市是完全赞成的，他更在1964年1月3日的中宣部和文艺界的座谈会上开创了用中央首长点名的方式把著名作家（孟超、田汉、陈半丁等）打成“反革命”的先河。

◇ “四清运动”是文革的一场预演

在1966年5月文革拉开序幕时，中国大地上还正进行着另外一场尚未结束政治运动，那就是“四清运动”。

这场运动的第一线领导人，便是刘少奇。刘少奇是把即将展开的“四清运动”完全作为一种文革式的政治运动来思考的。他在强调指出：这场运动要解决的“是生死存亡的问题，是亡党亡国的问题，使人民当权还是少数剥削者当权的问题。”（1963年2月25日）他恐怕还是第一个中共的领导人把这个政治运动提高到“亡党亡国”的吓人高度的。

随着四清运动的全面展开，刘少奇越来越左。他的一系列的极“左”言行不仅极大地助长了运动的左倾倾向，更坚定和鼓舞了毛泽东的许多还处于萌芽状态或正在形成中的极左思想。

首先，刘少奇的“桃园经验”在中共的最高层开创了“夫人参政”的极坏的范例，使毛泽东随后启用江青作为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先鋒和打手有法可依，有章可循。1964年8月27日，毛泽东批示同意把这一经验作为一个中共的“有普遍意义”的典型向全国批发了。姑且不论“桃园经验”的极左和荒谬，它更大的危害性还在于刘少奇向全党，从而也向毛泽东提供了一个利用自己的夫人参与上层政治的范例。在刘少奇之前，任何中共领导人，包括毛泽东，都还没有这么干过。刘以后，毛泽东在文革发动期搞得“中共中央批发《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1966年4月10日）和“桃园经验”就有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毛泽东大大地发展了刘少奇开创的“夫人参政”的经验，在文革中已经直接任命江青为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和政治局委员了。

其次，刘少奇倡导的“桃园经验”、“甘肃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的经验”和“天津的小站经验”等都采取“群众运动”（其实是“运动群众”）的方式，主张另组“阶级队伍”，进行“夺权斗争”，又为毛的文革提供了在体制外另组“阶级队伍”，进而“全面夺权斗争”的文革思路。

最后，刘少奇的所谓的“四清”经验中，逼、供、信和残酷的体罚现象比比皆是。为文革中的逼、供、信和打、砸、抢提供了极坏的样板。在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些在刘少奇指导下搞出来“经验”全部在复查后作为冤、错、假案平反，可见当时逼、供、信之风的酷烈。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一种叫“燕飞”的广泛使用的批斗人的模式，它就是文化大革命中斗人时极为流行的“喷气式”——它即可能就发源于刘少奇和王光美的“桃园经验”！

◇ 文革初期的毛刘“两条路线斗争”是一个伪命题

一个无法抹杀的简单史实是：刘少奇在文革发动中直至他失去自由前都是中共的第二把手，对中共发动文革的一系列文件和纲领，他都是投了赞成票的。那么，他对文革——即便是一个把他最后送入骨灰箱的政治运动，也就起码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这一点不仅为越来越多的文革研究者所认识，连刘少奇的儿子刘源都不得不承认。

然而历史的真相还在于：刘少奇在发动文革和领导初期文革的问题要远远超过一种一般性的“失职”。在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过程中，刘少奇所主持的一线中央领导对毛泽东关于文化革命的思想、纲领和步骤并没有什么“抵制”，而是千方百计地揣摩紧跟，唯唯诺诺，亦步亦趋。在伙同或追随毛泽东和他关于文化革命的胡思乱想迫害一大批下级干部，甚至自己的亲信上（如彭真和北京市委），刘少奇都没有提出任何应有的异议。相反只是一味拥护赞成，甚至落石下井。1966年4月21日，是刘在中央会议上第一个点名他的亲信彭真为“反党分子”。

其后邓小平等人也都和彭作了坚决的斗争。1966年5月16日，是刘主持通过了文革的纲领性的文件《五一六通知》。刘邓不仅举手赞成，更积极实践。邓小平5月31日急急忙忙赶到《人民日报》去改组领导班子。刘不仅在5月23日主持了批斗朱德的会议，还和邓小平一起在6月27日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讲话，极力提倡对毛的个人崇拜，鼓吹林彪的“政变经”。刘还竟然对他的亲信彭真等人说出了这样的话：“彭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就反对周总理，也反对陈毅、小平同志，也反对我。在我面前搞两面派，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彭真是长期隐藏在我们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者。”在7月2日刘邓又亲自实践《五一六通知》，在华北局工作会议上合力揪出了全国省委书记中的第一个“走资派”——内蒙古自治区第一书记乌兰夫。

自1966年5月到8月，刘邓主持的中央批发、转发过近十个有关文革的中央文件，其中点了近两百名从中央到地方的负责文艺、教育和宣传的高级干部的名，把他们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头面人物”，责令报刊进行批判。他们中有有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文化部副部长兼文联副主席夏衍等等当时文化界的主要领导。仅在中南地区，被他们以中央的名义点名批判的就有广东省作协副主席、《羊城晚报》副总编辑秦牧、中山医院党委书记兼院长柯麟、副书记兼副院长刘志明、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副校长何定华、前党委书记朱劭天、武汉市文化局党委书记程云、文联副主席武克仁、湖南省文联副主席康濯、河南省郑州大学党委书记王培育、副校长、省社联主席郭晓棠、广西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陆地，等等。长期以来，人们一直错误地以为：这些党内“自由派”的代表人物是毛揪出来的，其实对他们下手的是刘邓。由此可见，在抓“党内走资派”上，毛刘其实并没有什么“两条路线”的分歧。

当然，在文革初期利用工作队大整无辜的干部和群众，杀气腾腾地准备再打“几十万右派”的过程中，刘邓除了表现出他作为共产党领导人共有的冷酷外，还表现出了他们个人领导的中共政治运动的独创的残酷性。但是，决定和派遣工作组指导运动，都是事先得到毛泽东同意和批准了的。在这方面，毛的权术是“引蛇出洞”。如果刘少奇不派工作组，他在回京后可以指责刘“放弃党的领导”；如果刘派了工作组，则是“镇压群众运动”。无论如何，他都会找出“两条路线”分歧来置刘于死地。

刘少奇被迫害致死的悲剧根本就不在于他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什么“分歧”和“抵制”。他和当时一线中央的领导制定的文革方案都是经过了毛的批准，并且每周向毛汇报的。刘少奇悲剧的根本问题是在于猜疑成性毛泽东已经认定刘少奇是自己身边的“赫鲁晓夫”，严重地威胁着自己的权位，无论刘如何表现，都会找出借口除之为快。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所谓的文革初期

的毛刘“两条路线斗争”完全是一个伪命题。

刘邓无疑是文革的受害者，但是他们又同时是这一罪恶历史的制造者。如果没有对历史罪恶的声讨和清算，如果没有对其制度根源的发掘，那么一代人的牺牲，包括刘少奇本人的生命在内，便成了一场毫无意义的灾难，也就无法向文革时代作永远告别。追究历史责任、清算政治罪恶，揭示出文化大革命其实是中共“集体智慧的结晶”，即集体犯罪的结果。就不仅仅是为了死者和受害者，更是为了埋葬一个至今还没有被埋葬的黑暗时代。

□ 原载《争鸣》杂志2006年5月号

~~~~~

【往事如烟】

八公山下的再教育  
——文化大革命中的1969—1970年

• 方励之 •

今年又教广义相对论，不禁又想起了三十多年前的岁月……

1969年5月到8月之间的三个月，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间歇期。清理阶级队伍的高潮刚刚过去，新的高潮尚未到来。

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一开始（1968年夏），我就被隔离在科大。直到1969年5月才被准予回家。我的小儿儿子是在我被隔离后的第九天出生的。在我回到家时，他也快满一岁了。我还是第一次看见他。这三个月里，我虽然仍是无产阶级的专政对象，但生活不无逍遥。正值暑期，我们全家的日常活动之一是下午四点以后去颐和园游泳。当时颐和园的游人极少。深水区水也净洁。我们大都是最后几个游完上岸的人。向回走的时候，除了偶尔看到一两个船工在收船外，整个颐和园空荡荡的。从知春亭西望，夕阳正在玉泉山后缓缓下滑，塔影延伸到昆明湖面上，半隐半显。燕京十六景之一——玉峰塔影，只在此季此时才可以真正地看到。

这三个月里，算是我们一家最长的团圆期，其后的二十年（1970—1990）里都是分离的，或一分二，或一分三，再也没有长于一个月的团圆期。

◇ 下迁

新一轮风暴始于1969年8月末。当局发布命令（即所谓林彪第一号命令）：所有北京的大学都必须南迁，因为苏修要入侵了。北京的大学迁出北京，在历史上有过一次，是1937年，当日本即将打入北京的时候，大批学校迁往西南，那是战争所迫，是逃难。文化大革命的大迁校，更主要是出于共产主义的一条意识形态原则：和平会使人变成修正主义，斗争和战争才使人永葆革命的“青春”。

首先是北京大学宣布，将迁往江西鲤鱼洲。1969年8月29日，李淑娴首批被遣离北京去江西。一家的团圆生活就此结束。

中国科学技术大也要迁出北京。

不像北大，清华两校有过南迁的经验，逃难也颇井井有条。科大则像只没头苍蝇，向北京

之外乱撞，没有目标。科大接到迁出北京的通令后，有三个月迁不出去，原因是找不到一个地方愿意接受科大。当时，科大曾派人分头去四川、河南、山东等省联系外迁，都失败而归，没有一个地方欢迎科大。当然，北大，清华也不是去什么好地方，他们的新“校址”——江西鲤鱼洲，原来是个血吸虫疫区，老劳改农场。

只有诸葛亮的老家河南省南阳县，还有一点尊重智者的遗风，表示欢迎科大来诸葛亮的茅庐办学。可惜，一个茅庐容纳不下整个科大，作罢。在那三、四个月里，科大是被北京市委无价转让的处理品，摆在外面，任人挑拣，但没有人要。也不怪，毛泽东给大学的总评语是：池浅王八多。谁还愿意接收这种中国人最鄙视的动物组成的群体？

最后，安徽省接受了科大，同意迁到省会合肥。安徽以盛产王八出名。中国出口赚取外汇的王八（现在不应当再称“出口”和“外汇”，因主要出口地是香港），百分之八十出于安徽，所以，王八的名声，在安徽不算太坏。一次，我和一个同事背了一篓王八从合肥回北京过年。在火车上，我们睡着了。忽听一乘客大喊“谁的王八！”原来是我们的王八逃出篓外。除了连忙道歉外，赶快到全车厢抓王八。一快事也。

于是，全校迁往安徽。搬迁过程极匆忙草率。后来统计，全校的仪器设备有一半在搬迁中被毁坏。还没有看到一个入侵者，辎重已经自损一半。

1970年1月，春节一过，我们物理系的一批教师和学生动身去安徽。安徽接受科大，也并不是因为他们需要大学教育。到那时，大学停课已快四年了。到了安徽，继续停课。大学的任务不是教育，而是接受无产阶级的再教育。

因此，火车一入安徽，并没有送我们去合肥办教育，而是径直开进淮南矿区，要我们去接受煤矿工人的再教育。我们的一队是去谢家集第三煤矿（简称谢三矿）。

谢三矿位于八公山南麓。西面是寿阳县城。古时候，有淝水流过寿阳县城和谢家集之间，现已淤塞。所以谢三矿正位于“淝水大战”（382 A. D.）时东晋的阵地。前秦苻坚虽兵多将广，但因他没有望远镜，看走了眼，把八公山上晃动的草木都误认为是晋军，打了败仗。从此，苻坚被“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一语讥笑了一千多年。今天看来，苻坚也可能不是独一无二的。不是吗，就是有了望远镜的今天，伟大的统帅不也是满眼看到的都是阶级敌人吗。

我们到淮南时，八公山上已经没有草、也没有木了，是秃山一座。由于地下挖煤，造成地面不均匀地下陷。有的地方沉降多，有地方少，形成极难看的矿沉地貌，没有一点古战场的兵戎气势。只是寿阳城城墙还在，它比一般的县城城墙高大，似乎可以想得到苻坚登高远望八公山时的惊恐神态。

#### ◇ 矿井下的生活

谢三矿是五十年代用苏联的技术修建的。现在（2006）已经报废。当年在淮南矿区中，它是最好的几个矿井之一。平均日产量二、三千吨，煤的质量也很好，直接运往上海。

再教育的第一课，就是下井挖煤。妇女被禁止下井。55岁以下的男性学生和教师一律都要下井劳动。谢三矿的煤有两层，第一层深一百多公尺，第二层深三百多公尺。坐竖井里的缆车，垂直降下，进入地层。我们主要在第一层回采区。在井下，由矿工带路。开始走大巷道，直径约五公尺，宽敞，有路灯，类似地下铁路的通道。进入支巷道，路灯就没有了。除了人头顶上的一盏矿灯外，没有其他光源。路很窄，大家只能排成一列，在黑暗中相互跟随。这时，

最重要的是，紧紧盯住前面的晃动的灯光，随着前面的光走，不能稍有疏忽。有的地段，巷道曲折，不及时跟进极易迷失前人的灯光。那时，你的周围是各向同性的黑，找不到方向。遇此情况，决不要动，因为巷道网错综复杂，不熟悉的人，很容易走错。如果误入瓦斯区，还会有生命危险。原地不动，等工人师傅回来找你。

越接近回采区，越难走。已经不是路，而是大大小小的洞，有的洞只能容一个人俯伏爬行。进入回采区，空间又变得宽大。那是一个用密密的钢柱在地层里硬挤出来的一个空间，俗称掌子面，高约两米，宽约六米，二十多米长。人群沿着掌子面一线排开。挖煤。

挖煤的方法很简单。沿掌子面，有一条传送带（俗称溜子），只要把你周围的煤铲到溜子上，就完成了。煤的比重比山石小，所以，挖煤比愚公移山容易得多。在黑暗之中，除了脚下的煤，脚边的传送带外，甚么也看不到，甚至看不清近邻的同伴。因为相互看不见，也就极少谈话。工作时，除了听到铲煤声，溜子的转动声外，人群总是默默的。只有一次，一位眼睛不好的同事，不小心一脚踩到溜子上，人同煤一起上了传送带，向下溜。他大叫起来，人群才被惊起。幸好他很快被下面的人从传送带上拉了下来，免于变成一块煤的命运。黑暗也保护了他，没有人能看清他在溜子上的神色。随后，人群复归沉默，溜子继续转动。

“吃饭了！”一个声音传过来。工作停止，大家沿着掌子面一排坐下来。这时，一个布袋从排头起一个人一个人地传过来。袋中装有大饼，每人从中拿一个，这就是全部午饭。几分钟后，再传过来一个水壶，每人喝一两口，再递给下一个人，这就是全部饮料。吃饭之前没有洗手，矿下没有洗手的地方，也没有感到有洗手的必要。反正一切都是黑的，也看不清自己的手。在一切都看不见的环境里，人似乎会失去许多常规的反应。

上井以后，才发现全身是多么黑的。这时，再有大饼一定不会抓来吃。矿工洗澡池中的水也是黑色的，可以抓出煤灰来。不过，这样的水照样可以把身体洗净。

几次下井之后，就习惯了。有一次我和少数几个人还去掘进区“卖苦力”。任务是开掘巷道，把煤层切开，为回采开辟工作面。这里比回采区艰难。不能通风，空间里飘满粉尘。地层不断散发出被压抑了几亿年的热，温度极高，人人都是赤条条地工作。在惨淡的矿灯下，只隐约可见赤裸人体在黑暗中蠕动，从一个黑暗蠕动到更黑暗的前方……为但丁“神曲”作插图的古斯塔夫·戈尔大概下过矿，不然他画“地狱篇”不会那样逼真地再现了矿下的场景。

临近五一劳动节，谢三矿的井口上，挂上了许多大红标语，‘大干三十天，产量超万关’‘五一献礼，日产万吨’等等。不外希望工人多劳动，多产一些煤，并无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性。按我在井下工作的了解，多产一些煤，不是很难的事。凡在掌子面上工作，平均地说，每班工人在井下的八小时中，只有三小时是在挖煤。其余时间并不真干活，有时一连几个小时干脆静坐等待下班，实质的怠工。只要少怠一小时，就可以增产百分之十或更多。

可是，‘当家作主’的工人阶级，好像根本没有看见矿井上的标语。下井后，照样只工作三个小时，照样静等下班。全队工人皆如此，没有一点不同于往常。无产阶级专政虽很有效，但到一百多公尺的地下，威力就差了。当我也在黑暗中枯坐而不得不陷入沉思时，一个工人悄悄地说：“一天六毛钱，就干六毛钱的活！”

这六毛钱称作下井费，是工资之外的附加。不论何人，凡在井下工作一班就有六毛钱。理由是，井下辛苦也有危险。当时，煤矿工人的全国的死亡率是一年约两千人。还好，我们所在的半年，没遇上过井下事故。但死亡率还是高起来了。



## ◇ 抓 5 1 6

1970 夏季开始，进入文化大革命的第二个自杀高潮。第一个高潮是 1968 年，科大有十多人在清理阶级队伍时自杀，多是教师。第二个高潮，也有十多人自杀，多是学生。

新一轮的斗争，名叫‘抓 5 1 6 分子’。如何定义 5 1 6 反革命分子，在百科全书里都难查到。反正，它又是一顶无产阶级专政的帽子。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帽子就像纽约的大街，太多了，只好用编号当名子，现在要抓的是第 5 1 6 号。1980 年，我第一次到纽约，听到一个在长岛的朋友告我，他家的电话是 5 1 6 —……，当时心中条件反射式地一悸。

我已经有了一顶帽子（漏网右派），一般说，不会再得到新帽子。《共产党宣言》中有一句名言：“无产阶级只有解放了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我已经被无产阶级解放了。所以，新一轮运动，应该轮到解放其他的人类。5 1 6 号运动的目标主要是学生，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红卫兵。

我的任务仍是体力劳动。有时在矿井上，有时在矿井下。后来，我专职拉小板车。这种车是安徽最通用的货运工具。木制的。很像马车，但尺寸较小，车身宽 1 公尺长 2.5 公尺，车轱约 1.3 公尺，装有两个胶轮。主要由人力拉，也可由驴力拉。直到 80 年代在合肥的最繁华的长江路上，小板车的数量仍远远超过货运卡车。到处可见小板车流。我就在那种车流中生活了一个多月。

实话说，一个人拉车上街，是一种不失愉快的劳动。因为是夏天，像所有拉车者一样，我们可以公开脱掉上衣，尽情地享受阳光，警察也不会来干涉。安徽丘陵地多，大街也是起伏的，拉上坡有些费力，下坡时则可人车一起下滑，一张一弛，是一种很有节奏的运动。拉累了，可以找街旁一个树荫下小憩，乘凉。渴了，可以买一瓣西瓜吃，沿途到处都有西瓜摊，很便宜。严格说，凡被专政者上街买食，都应事先取得监视人的批准，但是我有信心，绝不会有人来检查我买西瓜是否持有批准书，因为，那些监视者正忙着抓 5 1 6 呢！没有监视，没有政治，一身的汗水，一路的阳光，两边的西瓜摊，混在小板车流中，拉啊！好不自在，尽管只是暂时的自在。一生里，又有那一次的自由自在不是暂时的？我的身体，很得益于那一段拉车生活中所吸收到的空气和阳光。

那些暂时还没有被专政也就暂时还没有自由自在拉车权的同事，看到我的被中原的太阳晒成一派古铜色的身驱，眼神里似也有一种羡慕。他们仍在努力地抓 5 1 6，一个个一副缺乏血色的面孔，一副病态。果然，七月一到，蚊子一出现，虐疾就开始流行。有一度，我一连好几天拉的都是虐疾病人，从谢三矿到矿区医院没有公共交通，只能由小板车运送。就拉板车来说，拉病人是最舒服的差事。拉过板车的人都知道，装货太多太重的车，当然不好拉；完全空的车，容易乱跳，拉起来也没趣味。人体几十公斤，对拉车来说是一个最佳重量，既不过重，也不过轻。我虽然常常送病人去医院，也常被蚊虫叮咬，也没有打预防针，但我始终没有得上虐疾。反动派们自嘲：可能我们身上血也是反动的，以致虐原虫也怕。

流行病并没有使抓 5 1 6 运动降温。我虽然不参加运动，但运动的冷热，是很容易看到的。斗争更加速了。学生一个个少起来。凡是有 5 1 6 嫌疑的学生，一个个被隔离，就如清理阶级队伍时我们被关在校园里一样。有的学生被关在谢三矿的工房里，情节严重者则被押送合肥。

有一个红卫兵，原来负责监管我们这些被专政分子，到七月，他不来管我们了，他自己也成了被监管的对象。

一个学生，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是个很活跃红卫兵，从谢三矿被押回合肥。不几天消息传回，他从四楼跳下，死亡。

另一个学生，并不十分活跃，七月开始经常一个人无目的的出走。语言渐渐不合文法，行为渐渐不合因果律。一天不见了，后来在运煤的铁路上被找到，躺在铁轨上，两条大腿都被火车齐齐截断，送到医院，失血过多，当夜死亡。那晚我正好去送另一个病人，也在医院。矿区医院的停尸间不在楼里，而是孤零零的一间小房子，房外靠近树林。那晚，停尸房外一直有物理系的同事值班守卫。因为，安徽的野狗（已恢复狼性的狗）极多，它们嗅觉极好，凡停尸间里有了新死者，它们就会成群地聚集在近旁的草丛里。到了深夜人静，它们就跳出来用头撞开停尸间的门，去吸吮新死者的血。守卫的人就是负责赶走这些想吃鲜血的狗，让死者得到安宁。这是名符其实的守灵。

这个卧轨者的灵魂，得以安宁，是不多的例外。在当时，凡自杀者，均按反革命论处，死后的灵魂也要遭到褻渎和批斗。

八公山下的死亡，鲜血，狗，最终驱策我走向了天体物理。只有最深远的天，才能避开世间的污秽，使灵魂找到一片静洁之地。

#### ◇ 广义相对论

矿区没有书读，除了毛书之外。因为，文化大革命中一个贯彻始终的“哲学”是：知识愈多愈反动。这条“哲学”，多半是毛革命的首创，找不到马克思，列宁的出处。在俄国十月革命中，似乎也找不到示例。

倒有一个反例。1922年，俄国内战正酣，乌克兰陷于混战。白军，红军，无政府主义帮派轮番上台。一天，奥德萨的数学教师 Igor Tamm 去郊区买鸡吃，被一派怀疑为另一派的奸细，抓了。审问者问：“你为什么反对祖国乌克兰？我们要处死你。”答：“不，不，我不是奸细，我是教数学的。”审问者：“数学？那好，回答下面的问题，如果答不出来，就毙了你：一个 Maclaurin 级数在第  $n$  项被截断，带来的误差是多少？答！”当然，Tamm 逃过了这一劫。凡是五十年代的物理系学生，大概都念过 Tamm 的“电学原理”。他在1958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文化大革命前还来过中国。我怀疑，如果 Tamm 也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指为“奸细”，那个 Maclaurin 级数，是否还能帮他逃过劫数。

很巧，在谢三矿的混乱批斗中，我居然成功夹带了一本朗道（L. Landau）的《场论》（Classical Theory of Fields）。与 Maclaurin 级数类似，是禁读的。不过，516混战正酣，人人自危，读书的危险反而小了。那时，为防蚊子，每个人都有一顶帐子，放下帐子来，尽可放心地看书。就这样，在淮南的几个月中，朗道这本书成了我的劳动之后的最心爱的，也是唯一的读物。每当暗夜降临，一身疲惫躺在帐子里的我，其灵魂往往就已经随着膨胀的宇宙去寻找那优美动人的原初奇点了。

彭加勒（H. Poincare 1854—1912）曾说过：“科学家并不是因为大自然有用才去研究它，他研究大自然是因为他感到乐趣，而他对大自然感到乐趣是因为它的美丽，如果大自然不美，那就不值得认识，如果大自然不值得认识，就不值得活下去……”

是的，大自然是美的，广义相对论是最美的物理理论（朗道语），人是值得活下去的。

后来，在中国，在美国，我多次教过广义相对论。今年，我的课又是广义相对论。我每每

想起，是广义相对论唤起的心灵之美陪我渡过了八公山的下肮脏、丑陋和蛮横，渡过了39度的酷暑、516的血腥、受虐者魂灵的呻喂……。我通过了再教育。

(2006年4月, Tucson)

~~~~~

【当事者说】

《亲历重庆大武斗》片断：军工井冈山总部决定发枪自卫

• 李木森回忆 • 何蜀整理 •

(一九六七年)七月七日，嘉陵江大桥南桥头发生了重庆“文革”中的“七七”事件。

当时，砸派的二轻兵团驻守在嘉陵江大桥南桥头的二轻局大楼，控制了南桥头交通要道。那天，据说先是二轻兵团与过路的八一五派发生了磨擦，随后八一五派的新六中32111战斗团和二七战斗团等便从二轻局背后的人民小学高处向二轻兵团发起进攻。进攻者居高临下，石块、砖头如雨点般飞来，二轻兵团处于被动挨打的地步，二轻局办公大楼的大玻璃窗被砸碎了，十几个人受了伤，他们只能往办公桌下面躲……他们打了几次电话向警司报告，但解放军一直不来制止武斗。在危急情况下，二轻兵团动用了二轻局保卫科的小口径步枪“自卫还击”，进攻者被打死二人。

枪声惊动了各方。起初迟迟不来制止武斗的五十四军，这一下子开来了四辆“制止武斗”宣传车和一批全副武装的士兵，把二轻局大楼团团包围起来，要求交出“杀人凶手”。二轻兵团认为自己是“自卫还击有理”，拒绝交人。双方就这样僵持着，部队把二轻兵团包围了一天一夜，

当晚，二轻兵团夏祥贵(1)夏司令打电话向我告急，要我设法帮助他们撤出包围。

我通知江北指挥部调集了一千多人，于第二天清早赶过大桥来，分别切断了上清寺的几条路口，严防八一五派人员来干扰，引起新的冲突。我还亲自到现场去看了看情况，还好，因为是早上，又有五十四军的人在那里包围着，只有一些看热闹的群众在旁边围观，还算比较平静。

二轻兵团得到支援，两百多人集体行动，强行撤离二轻局大楼，包围他们的五十四军官兵也不好硬加阻拦，只得让出一条通道。他们出来后就急行军走过大桥，转移到了江北的三钢厂。过了几天，夏祥贵带了几个人，乘火车上北京直接向中央文革汇报事件经过去了。

就在山城武斗四起这个时候，七月十三日，中央代表谢富治、王力、余立金及贵州省革委会主任李再含(2)，由四川省革筹组组长张国华、副组长刘结挺陪同来到重庆。十四日凌晨，他们在重庆警备区司令部接见两派代表，作了要求立即停止武斗的讲话。张国华和刘结挺还在上午9时发布了《关于立即制止武斗的命令》。

鉴于七月里发生的大规模武斗好几次都在国防工厂进行或与国防工厂有关，市革筹组召集了重庆国防系统两大派：八一兵团总部和军工井冈山总部的主要勤务员在五十四军军部谈判。军工井冈山总部人员在周应古(3)带领下参加了谈判。双方于七月二十三日达成了《关于立即停止武斗，抓革命促生产的协议》，其中提出两派都要“上交凶器”——当时还不叫“上交武器”，只叫“上交凶器”，即棍棒、钢钎、匕首之类。两派代表3000余人下午在人民大礼堂召开了“团结大会”。张国华、刘结挺出席并讲了话。

按照市革筹的要求，双方总部都要尽快开会贯彻执行协议。军工井冈山总部的扩大会议在重庆医学院召开。时间定在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二十四日报到。会议扩大到总部下属各兵团主要勤务员。

这时，重庆砸派已经改称反到底派。这个新名称是刘结挺提出来的，他在十七号与张国华一起接见砸派代表，讲话时说：砸派这个名字不好听，既然你们已经有了个红卫兵反到底司令部，何不就叫反到底派？造反到底嘛！于是我们就一下子都把称呼改过来了。

二十五日上午，军工井冈山总部扩大会议在重庆医学院的阶梯教室举行。会议安排是：上午邓长春（4）代表总部作形势报告，之后由周应古汇报两大总部谈判情况，并传达双方达成的十四条协议。下午分组讨论。

我作为总部的一号，是上午会议的主持人。我宣布了当天会议安排后，就请邓长春作形势报告。邓长春急步走上讲台。他神情严肃，语调沉重，告诉大家：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十分关键的阶段，山城的形势十分严峻……他用粉笔在黑板上画出了一幅简图，以军事指挥员的姿态按图讲解，说八一五派攻打建设（5）、长安（6）兵团，虽然没有捞到好处，两个厂反而被军工井冈山占领，但是，建设兵团和长安兵团仍处在八一五派的包围中，特别是长安兵团，一面临水，三面被包围，形势十分紧张。江陵（7）兵团应帮助长安兵团尽快摆脱困难处境，建设兵团也应设法变被动为主动。望江（8）东方红虽然在厂里是一统天下，形势比较好，但望江厂地处峡口地带，是水上交通的咽喉要冲，是兵家必争之地，肯定会成为八一五攻打的重点。如果望江失守，反到底的退路都没有了。因此，望江东方红一定要死守望江，保住望江……

正当邓长春讲得起劲之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阶梯教室的门外突然冲进一群人来，我一看，认得是我们江陵厂的军工九一纵队的年轻人，胡光全、刘学书、庞长康……为首的是他们的队长李朝兵。他们一个个满脸杀气，李朝兵边走边喊：“哪个是军工总部负责人？”

我立即站起来回答：“我就是。”

“你是工总司的，你走开！”他们继续往前走。

望江东方红的一个勤务员走过去阻拦，指责他们说：“你们干啥子？我们这是在开兵团以上勤务员会议……”话没说完，就挨了一耳光。几个军工九一的年轻人胀红了脸嚷着：“工业校的革命小将在流血，你们还在这里安安逸逸坐起开会！……”

邓长春从来没有这样冷静，虽然他们厂里的勤务员挨了打，他也没发火，边迎过去边说：“九一的战友们，别激动，坐下来给大家讲讲情况……”

几个年轻人坐下来，你一言我一语地讲了刚才发生的一件大事：

反到底派在化龙桥马路边的一个据点——工业学校，被八一五派攻占了！而且，八一五派这次动了枪！

“我们从红岩嘴下山，打算去救工业校红岩兵团，走了一阵，被一挺机枪封锁了路口。我们只有手榴弹和几把孬手枪，过不去……我们要求总部赶快把枪发给我们，我们一定可以把红岩兵团的小将救出来！”

一向好激动的邓长春，这次却十分冷静。听九一的年轻人讲完了，客气地请他们到另外的教室去休息，说总部马上研究他们提出的问题。

邓长春也不讲形势了，也不顾我作为会议主持人的感受，自己当起了主持人，改变议题，宣布讨论发枪问题。

说起发枪，自从武斗开始以来，就不时有人提出这个问题。因为重庆的军工厂里有的是武器弹药，特别是在我们军工井冈山控制的建设厂，成品库房里的枪是现成的。但是我们还从来没有想到过要拿出来使用。

因为这是个原来没有纳入议程的新问题，一时显得有些冷场。但是邓长春结合刚才得到的工业校被攻占的新情况，一启发，一引导，大家情绪很快就调动起来了，不到十分钟，会场上就热闹非凡，有的说应该马上发枪，不发保不住阵地，有的说发枪之前应该先研究好怎样发，先发哪些组织，后发哪些组织，发出后如何收回……

毕竟发枪是个太大的新问题，我们也是“老造反遇到新问题”。当天的讨论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不过，有了“七二五”工业校事件，就给了我们足够的刺激，因此赞成发枪的意见占了大多数，我也是赞成派。

第二天，七月二十六号，在大家继续讨论中，邓长春拿了一页十六行的草稿纸，提笔写了几行文字后，递给我看。那上面写的大意是：“李任死党”（这是当时对李井泉、任白戈等“走资派”的统称）挑起武斗，已经开始用枪屠杀革命小将了，山城文化大革命处于危急关头，为了保卫毛主席，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军工井冈山总部决定立即发枪自卫，发枪决定由军工井冈山总部常委签字负责……

邓长春已经签了第一个名字。

我看完后，二话没说，签上了我的名字。

邓长春拿起我签了字的文稿，依次找其他常委签字。建设兵团周应古、长江〔9〕兵团刘锡邦〔10〕……一个一个都签了字。

军工井冈山总部九个常委中，只有双溪〔11〕兵团的董源河没有签字。

他不签字的理由是，总部还没有研究好如何发枪，更没有研究好今后如何收回枪，仓促发下去会造成不良后果。邓长春跟他争执说：等什么都研究好了，不晓得到了哪一天了，可能我们反到底派早已被打垮了……邓长春说不服他，便骂了他一声“老右倾”。

决定发枪之后，又传达到建设兵团，然后具体部署发枪的步骤……这样，到具体实施发枪计划，大约是“八一”前后了。

发枪决定作出之后，邓长春叫我和周应古，我们三人开了个小会。也是军工井冈山总部三位核心成员的秘密碰头会，这个“三巨头”秘密会议，作出了深刻影响到重庆未来“文革”形势的重大决定：

第一，由邓长春和周应古二人，以军工井冈山总部的名义，到建设厂去宣讲总部的发枪决定，给建设兵团承担发枪责任，要求建设兵团将半自动步枪及子弹送到军工井冈山总部发放；

第二，发枪步骤是第一步先发军工总部所属兵团，特别是望江、长安、江陵，当然建设厂也在其中，第二步酌情发到反到底派各归口总部及军工总部在四川南线和北线的厂矿；

第三，邓长春、周应古、李木森三人，绝不能都在总部（重庆医学院），万一总部失守，三人遭遇不测，后果就会极其严重。因此，三人立即分工，邓长春回望江，负责守住重庆水路外出要道峡口，同时组织人马立即抢占南岸的制高点黄山，最后拿下南岸区；李木森回江陵厂，负责组织解救长安，再以江陵、长安两兵团联合作战，拿下江北区，打通嘉陵江大桥，与市中区两路口、上清寺一带连成一片；周应古留守总部，同时负责大坪、杨家坪地区，巩固建设厂阵地，尽快解救空压兵团，尽早拿下大坪、杨家坪一带。

上述分工，被以后的各类学习班批判上纲后称之为“三大战区”——江北战区、南岸战区、大坪杨家坪战区，而我等三人则被称为“战区司令”。其实当时并没有那样的说法。

这时，我还未满二十九岁，周应古二十七岁，邓长春二十二岁。这就是当年的“三大战区司令”。

在我的记忆中，江青七月二十二日那个肯定河南二七公社“文攻武卫”口号的讲话（12），似乎对我们影响并不大，那个讲话是什么时候传到重庆来的，我在什么时候看到的，都毫无印象了。因为当时武斗战火已经成为燎原之势，真可以说是“大势所趋，欲罢不能”，有没有她那个讲话，重庆的武斗都一样会发展起来的。

注：

（1）夏祥贵，时为重庆市沙坪坝区钢材改制厂工人，“文革”中1966年秋（23岁）参加造反，任重庆无产阶级革命工人二轻兵团勤务组组长，1967年6月任反到底工总司勤务组副组长。1968年6月重庆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任委员。“文革”结束后被清查，以“煽动武斗”等罪名“劳动教养3年，不戴政治帽子”。后经营私营企业。

（2）1967年6月下旬，毛泽东派谢富治（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王力（时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余立金（时任空军政委）、李再含（时任昆明军区副政委兼贵州省军区第一政委、贵州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四人以中央代表名义到云南、贵州、四川就地解决“夺权斗争”后出现的一些问题（特别是造反派的两派分裂问题），7月13日，谢、王等由四川省革筹组组长张国华、副组长刘结挺陪同从成都到达重庆，但工作尚未开展，当晚周恩来即打来电话要谢富治速去武汉接受紧急任务（为已到武汉的毛泽东加强保卫工作），谢向周恩来提出王力、余立金等同行去武汉，周同意了。谢、王等匆匆接见重庆两派代表后于14日凌晨离开重庆直飞武汉。

（3）周应古，时为国营建设机床厂工具科工人，“文革”中1966年秋（26岁）参加造反，曾参与发起组织重庆工人造反军，一度担任过八一兵团负责人。1967年5月任军工井冈山总部勤务组副组长。1968年6月重庆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任委员。“批清”运动中曾被关押审查。“文革”结束后被清查。后提前退休在私营企企业工作。

（4）邓长春，时为国营望江机器制造厂工人，共青团员。“文革”中1966年冬（21岁）参加造反，1967年5月任军工井冈山总部勤务组副组长，6月任反到底工总司勤务组常委。1968年5月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任常委。1968年11月在中央召开的“八一五”会议上因“武斗杀人”、“破坏大联合”等罪名被逮捕。关押至“文革”结束后1978年4月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刑满（减刑两年）出狱后在私营企企业工作。2003年病逝。

（5）国营建设机床厂，在重庆市九龙坡区谢家湾，五机部所属大型军工企企业，代号296厂（重庆1信箱），原国民政府兵工署二十兵工厂一分厂。

〔6〕国营长安机器制造厂，在重庆市江北区，五机部所属大型军工企业，代号456厂（重庆20信箱），原国民政府兵工署二十一兵工厂。

〔7〕国营江陵机器厂，在重庆市江北区大石坝，五机部所属军工企业，代号152厂（重庆65信箱），原国民政府兵工署第十兵工厂。

〔8〕国营望江机器制造厂，在重庆市南岸区郭家沱，五机部所属大型军工企业，代号497厂（重庆16信箱），原国民政府兵工署五十兵工厂。

〔9〕国营长江电工厂，在重庆市南岸区铜元局，五机部所属军工企业，代号791厂（重庆63信箱）。

〔10〕刘锡邦，时为国营长江电工厂理化室助理技术员。“文革”中1967年5月（28岁）任军工井冈山总部常委、军工井冈山长江兵团主要勤务员。“文革”结束后被清查。后以高级工程师职称退休。

〔11〕国营双溪机械厂，在重庆市綦江县赶水区，五机部所属军工企业，代号147厂（重庆4405信箱）。

〔12〕江青在1967年7月22日凌晨接见河南代表时的讲话中说：“我们不能太天真烂漫。当挑起武斗的一小撮人，他们拿起武器打你们的时候，革命群众可以拿起武器自卫，在双方达成停止武斗的协议以后，他们仍然不把武器收起来的话，你们自卫的武器不能放下！……我记得好像就是河南一个革命组织提出这样的口号，叫做‘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对的。”后来许多著述都把江青这个讲话作为导致1967年各地大规模武斗的主要原因，有的还将“文攻武卫”口号误记为是江青提出的。

□ 摘自《亲历重庆大武斗——重庆反到底派一号勤务员自述》第四章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wx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